《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观后感

建国以来中华民族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建设，身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深感骄傲，作为一个理科生十年有余专注与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研究而在本科学位将完成之际，沉浸与社会科学乐在其中。尤其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所深深着迷。

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为新中国的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特别是在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更是深有体会，毛泽东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成功者:他敢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战略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取得了政权;他引导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被战乱和贪腐蹂躏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的、没有饥荒的国度;他让中国重新找回了民族骄傲感和自信心，用他本人的话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53~1957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原型，并得到莫斯科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虽然生硬，但能以行政手段调动大量资源，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集体化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工人和单位也被捆到了一起。战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不久，中央计划的缺陷暴露无遗。虽然社会主义高举人人平等的旗帜，中国社会却是金字塔结构。身处金字塔底部的百姓缺乏激励机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泊;而高居塔顶的领袖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问责机制的约束。整个中国政府正在学习打造一个全新又包罗万象的“新社会”，错误不可避免。

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80%以上。1953年，中国政府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补贴工业化。1958 年实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两个政策都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1947 年到1952年，共产党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并分发给穷苦的农民。但是，几乎就在土地改革结束的同时，土地又逐渐被政府重新集体化。农民失去的土地，先是回收到农村合作社，后来归人民公社所有。1956 年，“社会主义高潮”席卷中国农村，毛泽东对此欣喜不已。随后的“大跃进”中，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而这场悲剧几乎完全发生在农村地区。如果说中国的农村在公社的管制下变得更有秩序，那么唯一不变的，则是无所不在的饥荒。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注意到的,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便“再也没填饱过肚子”。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误农、伤农政策，到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收入低于50年代的水平，有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及30年代的水平，比日本侵华之前还低。尽管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忍饥挨饿的八亿农民并没有让政府担忧。然而，另外一个群体却处在中国政治的中心。在毛泽东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一批又一批军队和党的革命元老被革职。许多人被囚禁，甚至失去了生命。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了曾经帮助中国战后重建的混合经济。随着私有企业的逐渐消除，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机构过度集权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1957年春,毛泽东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希望借此解决这些问题。知识分子被邀请参与讨论，政府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地批评，却被打成右派。

看到新中国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我为毛泽东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中的思考而觉得治国之难。这些缺陷包括反市场化、剥夺居民迁移权、垄断媒体以及激进的反智主义。

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还在思考权力交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此时的中国，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已经变得模糊，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社会已经从内部枯萎了。尽管所有人看上去无动于衷地活在惰性和冷漠之中，但他们的内心早已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即使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一定期盼着能听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最有思想的人不禁自问:“如果这个新中国并不是我们和战友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希望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但是，他们建立的中国却把20多年的时间浪费在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了。

从毛泽东逝世到1978 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间，中国便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并把发展经济作为新时期的第一要务，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建设中。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化大革命”走向了终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成为华国锋及新一届政府关注的焦点。1976 年，四个现代化经济纲领重新恢复活力; 一年之后，“洋跃进”也随之启动。成千上万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党员干部及“右派分子”得以平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迅速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共和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会议，它不仅重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还为重新凝聚千疮百孔的社会铺平了道路。会议将中国人民的能量、热忱和创造力从血腥的阶级斗争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1978年即将逝去之际，中国迎来了1949 年之后的又一.历史性时刻。这一次，幸运之神将更眷顾中国。在中国政府及全世界的学术界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市场转型开始的标志，是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的源头，是它成就了中国未来30年的卓越发展。然而，人们很容易过度解读这一分水岭事件，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注定的。但归根结底，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此次会议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能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只会是中国领导层对经济现代化的另一个美好尝试而已。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快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 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 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20制改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危机。1989 年，这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并延长了其持续时间。1988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的危机尤为突出。

这次改革方向的逆转对经济政策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在1989年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许诺，将会继续但以另外一种方式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这段讲话主要传达了他们对财政紧缩方案的决心，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立场;换言之，中国政府将会始终拥护公有制及中央计划经济。会上同时还提出了控制非国营经济增长及重新回到价格控制的具体措施。第一，乡镇企业——改革之初到现在最为活跃、增长最为迅猛的经济力量——将会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实际上这一想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被提出过，但从未受到重视；第二，把所有私营部门统统收归国有。这是中国政府发起的另一个宏伟计划，若被落实，私营部门]将会被迅速摧毁殆尽第三，与之前灵活的价格政策相比，中国政府更推崇将价格控制作为对抗通胀的手段。

当2008年中国市场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于7月18日闭幕时，罗纳德.科斯在总结演说中提出了“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的论断。2008年 12月10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30年的评论，强调了邓小平在这个传奇故事中英雄般的作用。在结尾处，该评论指出:“ 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

当中国政府放弃阶级斗争，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终于结束政治斗争的负和博弈，开始了经济发展的正和博弈。毛泽东宏伟的社会主义试验所带来的苦果，已经教会了中国人民对任何伟大蓝图和改革方案保持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别的发展方式几乎-无所知。这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或是改进，或是修补现行的经济体制。依旧团结在社会主义理想之下，他们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然而，到20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宣称的那样庆祝自己成为了一个基于集体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是一个民营创业精神高涨、市场力量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的精髓。一个中国谚语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诗意:“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